三味书屋

运河内外的故事

——读徐则臣《北上》

黄 岚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作品《北上》讲述了与京杭大运河相关的几个家族之间的一段历史故事。故事从1900年开始直到2014年结束，从一个意大利籍男子寻找他的弟弟开始。

意大利人小波罗，原名保罗·迪马克，一开始他只有一个“运河”的线索，因此他召集了包括翻译、船员、脚夫、保镖等在内的一批中国人，沿运河北上，以考察水利的名义，秘密寻亲。历史的尘埃渐渐覆盖这一段历史，百年后的一些普通人却因运河的联系又凑到一起，不得不感叹冥冥之中历史已做了最好的安排。

阅读小说的过程犹如一个猜谜的过程。作者徐则臣在本书结构上用了两条线分别进行描述：一条线是1901年小波罗带着翻译谢平遥以及船员、伙计等一群人，沿着运河北上；另一条线是21世纪谢望和、胡念之等人用考古等形式试图还原100多年前在运河上发生的这段历史。作者在小波罗这条线上设下一个个线索，埋伏下一部故事的楔子，然后在谢望和等人挖掘历史谜团时，这些线索一个个展现出来。如罗盘、相机、记满意大利文的记事本等物，这些线索很容易被当年事件的后人认出来，而这些后人又因为共同的“运河”因素而结缘，最后聚集到一个叫“小博物馆”的民宿客栈里。

小波罗沿运河北上的行踪大致如下：在杭州带上挑夫邵常来；在苏州租下一条船，夏老大带了一大一小两徒弟随船；翻译谢平遥在无锡上船；过常州到镇江时，遇到不友好的短袖粗布汗衫客，具有高度敏感性的夏老大意识到对方是拳民后，立即离开镇江驶向扬州，但在邵伯闸仍被汗衫客挑衅；在高邮，小波罗等三人被害怕战争的夏老大弃下。作为补偿，夏老大将烟斗留下；小波罗清点物品时发现他的记事本被小徒弟周义彦拿走；然后重新租下陈改鱼一家四口的船，一船七人在清水浦遭遇拳民；小波罗与谢平遥被拳民孙过程及所带来的义和团人员劫持，因谢有恩于孙过程之兄而逃过一劫。孙兄遇难，孙过程作为小波罗保镖随船北上；到济宁，小波罗遇劫受伤，拐杖落入运河中；船到通州时，伤口感染的小波罗病死。死前分钱给各人，并将罗盘给了邵常来，相机给了孙过程，烟斗给了陈改鱼，陈改鱼的双生子大陈小陈拿到了手枪，而关于运河的水利资料等全给了谢平遥。然而，自称水利专家的小波罗在运河上晃荡的真实目的却是寻找1900年随八国联军来侵华的弟弟马福德。

除两条线外，作者还用第一人称的口吻补叙了小波罗的弟弟马福德的故事。马福德是意大利人费德尔·迪马克的中文名，他出于对神秘中国一探究竟的好奇心，随军队来到中国。他的人性闪光点在于中途停止了打杀，借小腿骨折的机会偷偷离开了军队，来到风起淀寻找他心爱的中国姑娘秦如玉。他们在困顿中成亲，秦如玉父亲制作的《龙王行雨图》雕版也成了他们家族的传家宝。意大利人费德尔成了很中国化的马福德，最后因日本人打死了秦如玉，马福德以一杆30多年前的意大利枪为妻子报仇。至死未回家乡的马福德给孙女起名“马思意”，而马思意给儿子起名“胡念之”。

整部小说用了双线叙事，看起来是打乱了原本的故事走向，重新进行了时空分配。要看清小说在讲什么，必须时刻进入“探案”状态，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本书吸引我的另一个原因是作者将爱情描写得很唯美。马福德对秦如玉的爱至死不渝，他与秦如玉语言不通，凭着生硬的几个汉语词汇，硬是找了过去，捋不直舌头的他用五个字“如玉，我来了”，到底将如玉给“捋直”了，而结结巴巴的“我欢喜你”就是他对爱情最中国化的表达了。另一场爱情发生在寻找运河故事的谢望和与孙宴临之间，他们的故事，作者描述得比较含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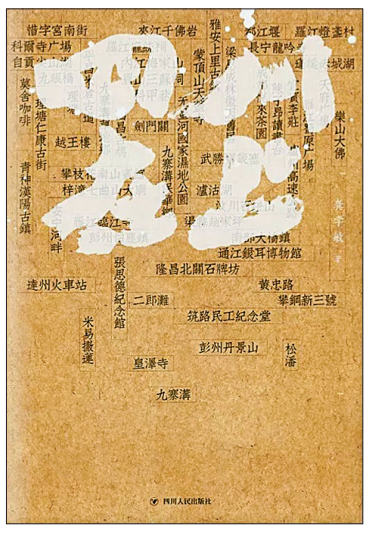
看到最后发现，就像文中的“水利专家”小波罗不是真正的水利专家，这本写运河的书其实也没有真正书写运河，作者不过是将“运河”当作一个道具，演了一场声东击西的戏罢了。当然戏里戏外的精彩，足以吸引读者。

锦官城的现代花重

——读龚学敏诗集《四川在上》

方其军

常常，读者对一些优秀诗人的作品熟悉后，能判断某一个未署名的作品出自谁的手笔。我喜欢以此自我娱乐地预估哪位优秀诗人能进入文学史。文学探索形成的基因式特征，对于一位诗人的创作成就与文本影响，有着关键性作用。这种特征与符号，像灯塔，在苍茫的文学渡口呈现清晰的形象。比如，以我的阅读经验，从海子读到麦子在风中的沉重，从骆一禾读到神谕般高亢肃穆的秋日歌吟，从欧阳江河读到一秒千年的时空倒错，从多多读到雄浑的“思绪泥石流”……若他们的哪一首匿名诗作摆在我面前，我想，我可对号入座逐一标注姓名。



我觉得，生长于巴蜀大地的龚学敏亦是一位特征鲜明的诗人。读他的诗作，我仿佛穿行于某处雨林或石板路，脚掌时常硌着四川人文的一块块骨头。四川是出李白、苏东坡的地方，其诗歌的唐宋遗风是浸润在泥土里的。龚学敏的诗集《四川在上》是一份私家的“四川文化地图”，当我阅读时，像苍鹰巡视巴蜀时空，看见龚学敏的诗行接通现实与唐宋、紧贴河床的潜流与航船犁开的波浪，以及迎接其生命的九寨沟与整个世界。如果在成都，我会随诗行走走黄忠路、科甲巷，去喝一杯莫舍咖啡，在悦来茶园看川剧。

诗集《四川在上》分成21个篇章，各篇章以四川的各地市命名。第一篇章“成都”，收有14首诗，第一首诗《黄忠路》的起句是这样的：“车载台的三国，像街上拖着的大刀／把游客逼进街名线装的破损处”。我曾看过一部电影，想不起片名，记得所述的环境是多维度的，在不同维度生活着不同的物种，人类在平常维度戴上特殊眼镜后，可以看见、进入另一个维度，不同维度的人可以形成联系和打斗。有时我觉得，诗歌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眼镜”，借助它可穿越于不同的时空维度，满足读者一定的知晓欲，参与犹如盗梦的审美体验。那“街名线装的破损处”，似是一个修辞的虫洞，试图揭晓某些沉默的细节：“给三国的失效期照明”。

诗歌，是诗人将捕获的情感形象化于纸页。在《四川在上》中，龚学敏的每一种思绪，每一份情感，都以词的血肉和句的身段惟妙惟肖呈现着。末尾一个篇章是“凉山”，收有4首诗，最后一首诗是《在西昌古鸠莫移民搬迁新村》：“从荞麦花的被子中孵出的新村／最高处的旗杆的树／向风致意，风成为辽阔的／芬芳／盛满凉山的字典。我们写出的词／有太阳晒在新被子上的鸟鸣”。原本看不见摸不着的情感，在这里却是可触摸的了。诗人的运思是一种冷却或采撷的过程。倒数第二首是《邛海》，起句是“铁链拴住的鱼腥味，被鸥啄破”。这“鱼腥味”居然可以被铁链拴住，可以被鸥啄破，那就是一种固态存在啊。这是诗人运用了比通感更强的“魔术”：具象呈现。

诗集《四川在上》的题材构成有怀古幽思、会友寄意、生活速写等。例如《陈子昂读书台》《在眉山三苏祠写两茫茫》，一听就有古境生气蓬勃；《都江堰，元月二日，雪，听陈大华兄吹尺八》《在蓬溪赤城湖与吕历瘦西鸿众兄弟饮酒》，一读就有世间情义绵长；《天府广场遇雨》《梓潼七曲山大庙文昌星祖庭遇雨》，一看就有刹那触景萌念。龚学敏的大多数诗篇流淌着欢快而明亮的暖意，像阳光晒着的溪流，穿过林间、乡村与城市。然而，也有晦暗与沉痛的，比如“阿坝”篇章中的最后一首《九寨殇》：“怀孕的田野被葬礼／撒在行将死去的飞翔中……黑颈鹤用割断的喉／抹去人、酥油、房屋、月光和森林／水露出大地黑色的底牌。”可以猜想，这是诗人在九寨沟地震后作为一个乡人的哀伤与恸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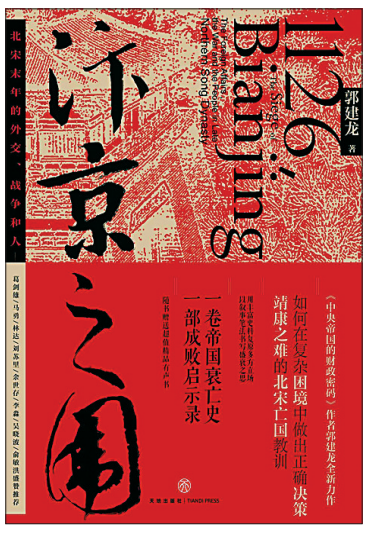
年少时节，我的一个表哥在四川做汽配生意，春节回乡时，他用当时全村唯一的电话机给四川的伙伴打电话，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四川话。具体说了什么，我已忘了，但是那种把某个字的音拉长又往回收的调调，记忆犹新。如今我想，这种调调，可能就是李白的话，可能就是苏东坡的话，可能就是龚学敏的话。杜甫在四川生活多年，或许也沾染了四川口音，那句“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就是用四川话所吟也未可知。居于成都的龚学敏以“杜甫草堂读《绝句》”为题，对杜甫予以追念：黄鹂被草书的烟圈牵在手机上。翠柳把坛子里的酒肉泡成假寐……门一遍遍跑过水和溺亡的土话。风蔑视的纸悉数叠成了万里船。嗯，杜甫见到的花，盛开至今。

北宋末年的那段痛史

——《汴京之围》读后有感

痕 墨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进程中，是颇有几段令人深感悲哀的“痛史”的。比如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后使得神州陆沉的“五胡乱华”，导致明末“天崩地陷”的清军南下，还有郭建龙先生这本史学新作《汴京之围》中写到的北宋末期，徽、钦二帝无奈“北狩”的靖康之耻。



关于靖康年间的种种，不少中外历史学家的专著中有较为详尽的分析。譬如美国女学者伊沛霞写的《宋徽宗》一书，同样提到了那位在艺术上天分极高的亡国君主忍辱含垢、被迁金邦、殒命五国城的情节。但《汴京之围》和《宋徽宗》的视角不同，后者从帝王这个特殊个体的角度出发，从统治阶层的政治失策来挖掘那段“国耻”之肇因，而前者的格局和视野明显更为开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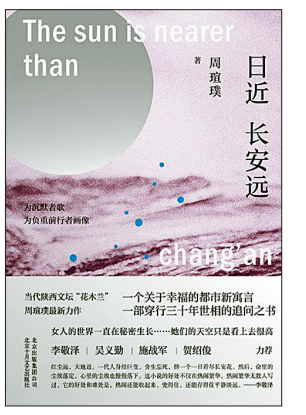
《汴京之围》所采取的不仅是“大宋视角”，也有大量从辽、金立场出发，揣摩这两个少数民族政权战争心理的篇章，而且此书始终是将北宋帝国最后的危局爆发放置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观点之下。从表面上看，宣和年间的大宋呈现出一派繁华鼎盛、政通人和的景象，可从“宣和”至“靖康”，深藏于帝国内部的各种危机纷纷暴露。先是徽宗的穷奢极欲加剧了国家的财政危机，由蔡京主持的改革又将国家困难转嫁给了无辜百姓。及至事情愈演愈烈，宋廷为了转移矛盾，首先打破宋辽和平——徽宗在对金国实力误判的情况下，意图通过订立危险的“海上之盟”，要回当初石敬瑭贿辽的“燕云十六州”。在和大金辗转订约的过程中，北宋自建国起就存在的重文轻武、冗官冗兵等军事痼疾彰显出来。金朝贵族们也一步步看清了徽宗皇帝虚弱无能的面目和大宋军队孱弱可欺的本质。当然，北宋朝内也并非没有有识之士，他们早就看出了外邦的觊觎之心，可自古以来话语权总是掌握在军事力量强盛的一方。金国终于在灭辽后不久，大举攻宋。靖康元年(1126年)十一月，汴京城陷。巍巍帝国，就这样在短短三年之间，轰然倒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作为一本历史学著作，《汴京之围》一方面综合了宋、辽、金三方立场的史料，进行晓畅明了的叙事分析。另一方面，作者的一些可供读者推敲的历史观点也渗透于书作之中。譬如，郭建龙先生并没有将金人扶持的伪皇帝张邦昌作为一个“乱世小人”来描述，相反，作者认为，此人身不由己“登”上帝位，确实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难能可贵的是，张邦昌在知道自己注定会背负千古骂名的情况下，依然竭力保护了大批汴京百姓的生命。也是在他的恳求下，金人减少了对北宋朝廷的压榨。此外，赵恒、李纲、陈东、马扩……对这些历史人物，作者未曾人云亦云，而是发表了独到的见解。

历史从来不是空洞潦草的结论和一成不变的教条，历史的罅隙中往往隐藏很多发人深省的内容。靖康之难背后就有太多容易被后人忽视的细节：宋辽、宋金关系的微妙变化和转折节点；尊崇道教的风气下，宋军将领相信奇人异士能撒豆成兵的荒诞思维；金国内部不同派系间的明争暗斗及他们对北宋君臣态度的差异；康王赵构几度死里逃生，最终从皇族劫灰变成了南宋开国君王……所有的一切凌乱纷繁，难以捉摸。其中，作者尤为关注的是，北宋君臣是怎样共同作用于庞大的帝国机器，自以为操控得当的他们又是如何导致了王朝覆灭？这也是该书破解北宋由盛至衰密码的关键所在。

荐 书

《日近 长安远》



作者	周瑄璞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日期	2019年6月

有着陕西文坛“花木兰”美誉的周瑄璞，曾荣获中国女性文学奖、柳青文学奖，多篇作品被收入各类年度小说选本，享誉当今文坛。多年前，描写普通人奋斗历程的长篇小说《多湾》一经问世，就引发热读，广受好评。

新作《日近 长安远》的书名出自《世说新语·夙惠》，晋明帝说抬头就能见到太阳，可是长安却很遥远。后世的文学作品，如《西厢记》《桃花扇》又对“日近长安远”这一典故不断升华，喻指京城遥不可及，事业、理想很难实现。周瑄璞五易其稿，将小说命名为“日近长安远”，更是耐人咀嚼。这是一部关于生命与选择的“交响乐”，小说中的两个女孩虽然性格迥异，却都感受着生命，思虑存在。有时“存在”并不耀眼，也许只有细微的光芒，却可成为永恒。

《日近 长安远》共16章，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为沉默者歌，为负重前行者画像”，作者鲜活再现了人间世相，体验了人生的创痛，领受了时代赐予的智慧，凸显出社会演进中的生存状态。作者通过独特的视角，建构宏大叙事，奋力开凿文化岩层，发现其中的风景——小人物的命运虽因大时代的变迁而起落，顽强的生命与人性的光辉，却在磨难中百折不挠。

青年评论家吴义勤认为：“《日近 长安远》是一部时代的风情长卷，情节发展与人物命运走向相交织，心理描写老到成熟，内在冲突始终盘旋，充满人生智慧和生命张力。主人公的命运是喜剧，也是悲剧，它深深打动了我，让我看到了艺术重要的核心——真善美”。

（推荐书友：戴骏华）

《残酷的故事》

作者	(巴拉圭)丽塔·佩雷斯·卡塞雷斯
译者	魏媛媛
出版	中央编译出版社
日期	2019年5月

《残酷的故事》共收录了《我和加德尔》《双鱼座旅馆》《远离伊甸园》等21篇短篇小说，其中大部分书写的，是一场疯狂掠夺的侵略战争给富饶的巴拉圭带来的惨不忍睹的破坏和给人民造成的令人发指的灾难。本书是巴拉圭著名女作家丽塔·佩雷斯·卡塞雷斯的代表作之一。

在《我和加德尔》中，那种融合了恐怖灯元素的文体，为这篇描写人物性格的小说赋予了光芒。在《兄弟情》中，伊莱内原本想调查双胞胎哈恩兄弟的奇怪生活，然而随着接触的深入，她不想再调查下去了，因为哈恩的一个眼神让她失去了调查的欲望。哈恩的眼神向她清楚明白地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一切皆会被遗忘，时间如同沙尘暴一样会抹掉一切，所有的一切，好的抑或是坏的种子。”在《穿越彩虹桥》和《觅得我归宿》中，作者多次用闲笔和细节描写表现女主角在突破常规沉闷生活时的勇敢：“离开家门的那一刻她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坚定与决绝，昂首阔步，目光望向无边的天际。”“我几乎是怀着愉快的心情向湖边走去，一路上，我能察觉到风儿是如何从长睡裙卷动到我的脚面，能感受到踏在露珠上的脚掌是怎样被打湿，我还听到了一种陌生的旋律。”

西班牙语专家尹承东如此评价卡塞雷斯：“这位女作家认为，所有人诞生于现实之中，作品中的人物跟我们每个人一样行走和呼吸，所以读者读她的作品始终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对作品中的人物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由此，她的小说可以通过美学的视角更广泛、更有深度地领会、解读和赏析。

（推荐书友：时中）

《河山》

作者	周晓枫
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19年3月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河山》是一本带领读者去体悟祖国秀美河山的散文集。

跟随作者的足迹，游走于《河山》之间，这里既有山林的巍峨，也有河海的浩瀚，既有原野的高旷，也有沙漠的低远。每篇文章就是一段旅途的记忆和见证，读者的目光跟随着作者的娓娓叙述跨越千山万水，落在那些造物者的“无尽藏”之上，以一颗对大自然满怀敬畏的心去探索“吾与子之所共适”的万千世界。

作者对所到之处的描写惯于先对当地的地名加以憧憬式解读，抑或以某一标志性事物作为“起兴”，继而引出当地的人文历史、现代生活，勾勒出地域发展的长卷。如《春日阆中》一文，作者先把目光聚焦在“阆”字上。认为“阆”字是门楣之后伫候着温润的良人，“阆”字的字形结构与人们对世界的美好想象编织在一起。来到阆中，作者先登上锦屏山，驻足山林向古城俯视，阆中的古老院落和街道细节在云雾的氤氲中逐渐淡化，只见黑灰色的檐瓦重重低垂，阆中就像是巨鱼露出的宽展展的背脊，为了“日夜啜饮锦屏山下这一湾嘉陵江水”而蓄意搁浅。走进古城，五月的阆中给游客印象最深的是婆娑的树影、宜人的芬芳和古色古香的情调。这里有执迷于棋局的白发老者，跌跌撞撞的垂髫幼儿，宛如桃源景象。与那些空气中弥漫着浓厚商业气息的景区不同的是，阆中以其简单质朴、未加刻意雕饰的素颜静静地等待着过客。

个人体验丰富独特，字里行间韵味悠长，洞察历史目光深远，精神探索直入灵魂。在作者笔端，一片树叶勾起浓酽岁月，一张剪纸演绎千年的悲欢离合，一个柑橘渗透着生活百味。

（推荐书友：徐舒薇）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